

YONGWU
JINTOU
DE GHUNTIAN

永无尽头的春天

—— 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



[捷] 伊日·贝利康 著

383
0423
114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永无尽头的春天

——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

(捷)伊日·贝利康著

邹福兴 赵其昌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P

1985, 8, 10.

Ein Frühling, der nie zu Ende geht
Erinnerungen eines Prager Kommunisten
S.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76
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S·菲舍尔出版社1976 德文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永无尽头的春天

——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

(捷) 伊日·贝利康著

邹福兴 赵其昌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37,000 字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3071·362 定价: 1.4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是伊日·贝利康的回忆录。

作者是1939年入党的捷共党员，早年参加过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斗争，捷克解放后曾先后担任捷克青年团和国际学联的领导职务。1963年起任捷克电视台台长，是“布拉格之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68年8月21日苏军侵占捷克后不久，被派往捷克驻意大利使馆任参赞。1969年8月开始政治流亡生活。

本书是1975年写成的。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捷克约三十年间的政治变化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于“布拉格之春”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于苏联侵捷事件的始末作了系统的介绍。同时，作者还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专政、对斯大林的评价、各国共产党之间以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东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作者五十年代曾两次访华。书中还谈到了我国的一些情况，其中个别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们作了删节。

Y. K. Belik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

“星期二，前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伊日·贝利康在他的罗马住所收到了一个炸药邮包。这位侨居在意大利的记者是“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贝利康在打开邮包时发现包中冒出一缕可疑的青烟，便在烈焰升腾以前及时地将邮包扔掉了。”

1975年2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

1975年2月4日……

就在那一天，我终于下定了写作本书的决心。我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已经很久了，大概是从1968年8月20日至21日夜间开始的，在那天夜里，苏联坦克使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希望破灭了。我当时觉得，在那天夜里，数十万共产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

但是，人是可以忍受很多次考验的。我想为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经历过抵抗运动的锻炼，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又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式的检查——提出一篇诚实的证辞的打算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有时甚至被遗忘了。但是对于“布拉格之春”运动这场遭到破坏的“最后的斗争”，是不可能遗忘的，因为我怎么能够甘心自己三十年来的生活理想遭到歪曲呢？

1975年2月4日那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个装着炸药的邮包……。这一警告已经够明显的了。由于他们要使我保持沉默，我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终于只好开口讲话，谈谈那些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情。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积极的党员。在我读过党的关于所谓“破坏法制的行为”——这是他们的一种羞羞答答的说法——的报告以及听到我国警察及其犯人们所陈述的种种情况以后，我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完全不能排除他们有朝一日将我灭口的可能性，除非我象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博胡米尔·拉乌斯曼在1953年所做的那样突然下决心“自愿”返回布拉格进行令人高兴的自我批评。我也可能成为一次比炸药邮包事件准备得更加周密的车祸事件的牺牲品。总之，我在那一天终于接受了出版商关于写作本书的提议。

我知道，叙述我本人作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人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中的种种矛盾，并从中得出一些不但同我的祖国、而且还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有关的结论，是一件需要冒风险的事。我也知道，在我的那些被迫保持沉默的同志们面前，我有责任这样去做。当然，本书所介绍的是我本人的生活，书中所谈到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感受。然而我知道，有数百万同胞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人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基督教徒和自由党人）在很多方面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他们无法开口讲话……。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多久呢？

我也同样知道，不但布拉格和莫斯科的干部们，而且西方的某些人、甚至我的许多朋友都会对我的证辞感到不悦。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无疑都是些诚实而有教养的人，但却担心别人扰乱了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刻板的世界观。这些人对有些问题宁愿采取拖延的态度，对有些事实宁愿采取掩盖

的态度，“以免造成危害”——但是危害谁呢？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本人也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有过类似的想法，而且保持了沉默。毫无疑问，我是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历之后，才明白这样一点的，即：拖延问题或掩盖事实对于我们所捍卫的理想并没有好处，相反，这只会使我们的理想遭到歪曲。

我十分清楚，政治经常是以必要的妥协为基础的，所有这类妥协都要求人们对于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但是，假如我也用那种不痛不痒的“策略上的”考虑磨去我的证辞的锋芒，那么，这样的证辞难道还有丝毫的价值可言吗？

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促使他去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就曾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时刻，它会使人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第一次是1940年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当时我看到，我的同志们是如何地遭到拷打、杀害或被转送到集中营里去的。后来是1961年，党指控我是“叛徒”和“阴谋家”，而实际上我的全部思想和工作都是为了党，而且把党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再以后就是1968年8月20日至21日的夜间，当时我看到，苏联坦克怎样包围了捷共中央委员会的大楼，苏联警察又怎样把我们的领导人带走，对待他们就象对待“战俘”一样。最后一次是1975年1月15日，那时捷克报刊上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的诽谤运动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例如党的机关刊物《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居然揭发我是从前盖世太保的特务！

我并没有去反驳《论坛报》的这种诽谤——即使去反驳也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当政的共产党的报纸曾经发表过一个受歧视的人的辟谣声明——，而是对我自己的一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员？如果让我再进行一次选择，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从1945年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原谅那些后来使它变得十分

可笑的错误和罪行？对于“现存的社会主义所发生的蜕化变质”，我本人作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过去和现在应当负有多大的责任？在我已经看清我们的理想破灭以后，是应当继续以往的努力呢，还是应当完全隐退甚至转到对立的方面去？在1968年8月20日事件以后，是应当接受和屈服于“悲惨的现实”，期望党有朝一日会找到必要的力量来实现人道主义化呢，还是同这种“现实”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这种“现实”更为正确，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呢？

在我经历了这种种事情以后，我是否还有权利去信仰一种确实能够保障公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正义和尊严以及更多的积极参与决定的权利的、区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为了实现这种变化，应当具备哪些必要条件呢？此外，有什么东西能向我们担保，那个早已变质的社会主义不会去破坏发达国家中实现这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真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这次我没有把这些问题一推了之。我让它们自由地表达出来，并力图找到答案，丝毫不抱成见，丝毫不加妥协。因为除了我的名誉以及我对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信念以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就这样，我好象站在自己的良心的法庭面前。我希望读者同我一起来寻找正确的答案，因为其中的许多答案对于读者的关系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密切。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第一章 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1)
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11)
慕尼黑.....	(15)
斯大林同希特勒的条约.....	(17)
监狱——学校.....	(21)
反抗的代价.....	(27)
国民法院.....	(30)
潜逃.....	(32)
乡公所秘书帕洛乌列克.....	(36)
斗争在继续.....	(38)
虚假的神话.....	(41)
解放.....	(43)
返回故里.....	(46)
我们内部的法西斯.....	(49)
第二章 斯大林的阴影.....	(51)
党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目标.....	(51)
“布拉格政变”.....	(55)
权力的逻辑.....	(59)
我本人的责任.....	(61)
同铁托的冲突.....	(64)
在“敌人”那里的一次逗留.....	(66)
一次为莫斯科准备的汇报.....	(69)

怀疑的时代·····	(76)
政治审判案·····	(81)
老一套的指责·····	(84)
潜在的敌人·····	(86)
连接莫斯科的脐带·····	(87)
迫害运动中对党证不予考虑·····	(90)
不眠之夜·····	(92)
犹太人·····	(93)
“上帝”之死·····	(97)
第三章 在毛和其他人的国家里·····	(100)
归队·····	(100)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冲击·····	(108)
赫鲁晓夫来了·····	(116)
一个来自东方的共产党人在世界上·····	(118)
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	(120)
中国使我们觉醒·····	(124)
大跃进·····	(129)
菲德尔和切·····	(131)
第四章 官僚体制的幕后·····	(138)
怀疑·····	(138)
阴谋·····	(141)
为西柏林的解放干杯·····	(148)
一阵新风·····	(152)
党的机器·····	(154)
检查员·····	(160)
不可能的对话·····	(163)
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	(165)

操纵德国战犯·····	(168)
分等级的消息·····	(171)
孩子替父母受过·····	(174)
一个官僚的叛逆·····	(177)
第五章 布拉格的星星之火·····	(181)
诱因·····	(181)
杜布切克·····	(187)
春天始于元月·····	(191)
真理的爆发·····	(194)
“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	(198)
杜布切克的困难处境·····	(201)
诺沃提尼的倒台·····	(206)
斯沃博达的崛起·····	(208)
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	(212)
叶皮谢夫将军等人的事件·····	(214)
恢复名誉·····	(217)
阴谋家：勃兰特、谢尔、克赖斯基·····	(219)
如果取消书报检查制度·····	(225)
第六章 坦克的命令·····	(229)
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躲起来了·····	(229)
做一个捷克人是值得自豪的·····	(232)
加里西亚的犹太人——切尔纳会晤·····	(234)
达摩克利斯剑·····	(238)
乌布利希的圈套和阴谋家·····	(242)
八月二十日·····	(244)
“邀请”失败·····	(247)
我要找“鸡”·····	(251)

党的秘密代表大会·····	(254)
城下之盟·····	(257)
问题仍然存在·····	(260)
外交官·····	(262)
德国共产党人·····	(264)
格列奇科元帅的突然袭击·····	(266)
第七章 没有尽头的春天·····	(269)
流亡·····	(269)
没有党，没有祖国·····	(271)
党永远是正确的·····	(272)
难以相处的伙伴·····	(274)
我们和共产党人·····	(276)
我们和社会党人·····	(278)
我们和俄国人·····	(279)
从发表批评发展到成为反对派·····	(282)
不要一边倒的支持·····	(284)
正常化的技巧·····	(286)
第八章 建立另一种社会主义可能吗·····	(290)
建立哪一种社会主义·····	(290)
一党制和反对派·····	(292)
社会主义和自由·····	(294)
真正的困境·····	(297)
三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300)
对新的开端的几点结论·····	(305)

第一章 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事情发生在1961年9月。我刚从保加利亚度假回来，一到布拉格，就被叫到党中央委员会去了。

“中央国际部的拉斯托维契卡想和你谈一谈。”

“巧极了”，我心里这样想。作为国际学联的主席，我很久以来就一直想跟他谈一次话，谈谈我的工作问题。

中央委员会大楼座落在伏尔塔瓦河畔，当我向门卫出示党证时，他们向我行了一个礼。一位彬彬有礼、但又冷若冰霜的秘书把我带到拉斯托维契卡的办公室。拉斯托维契卡友好地接待了我，问我国际学联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碰到了一些困难”，我说。“我们正筹备召开关于学生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问题的国际会议。阿尔及利亚代表和中国代表反对苏联的路线，他们认为争取民族独立比争取和平更为重要。”

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跟我来，同志们想和你谈一谈。”

我想，一定是哪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要见我。我走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厅，看见有几位我经常见面的布拉格的朋友，另外还有几位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在场的还有一些我本人并不认识的党的干部，其中有马穆拉，他是令人畏惧的中央委员会主管公安和军事的负责人，是我国政权的铁腕人物，还有宣传部

长乌尔班。

显然，大家是在等什么人。乌尔班同志毫无拘束地同我闲聊着，直至两个我不认识的人走进房间。乌尔班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他要我们大家坐好，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用冰冷的语调念道：党发现了一起阴谋，是由一些党员策划的，目的在于推翻党的政策而以修正主义路线来取而代之；参加这一阴谋的人同某个外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政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的结论是：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属于这一阴谋集团，党要求我们，在此案移交司法部门以前对我们所进行的颠覆活动作出全面的交待。

这真像是炸弹爆炸一样。我在党内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从未受过丝毫的指责。长期以来，我同党的负责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友好的一般关系。诺沃提尼同志很了解我。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听着，贝利康同志，你搞学生运动已经很久了。为了使你获得更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决定派你到党的县委会去”；或者对我说：“你的工作实在太差了”，这我倒还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并不是这样！一纸三分钟的声明，我便给戴上了阴谋家的帽子……

“这里在场的人只是这个阴谋集团的很小一部分”，委员会主任接着说道，“其他人已经在邻近的几个办公室里受审。所以，你们应当向党交待全部情况，否则警察会让你们开口的，那就要糟得多了！”

我的一位朋友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在开玩笑吧。我是从你们这里才听说有这么一个阴谋集团的！即使你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那也一定是弄错人了。说正经的：我在这里见到了贝利康。我认识他，这不假，但是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他了！至于其他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果我们有失于检点之处，那么请告诉我们，在什么

地方、在什么时候。”

委员会主任板起了脸：

“有关什么问题，你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们发给你们每个人纸张和铅笔，然后每一个人由两位同志看守，单独到一个房间里去把所有情况都写出来，直到写完为止。不许互相交谈或给外面的人通风报信。”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对于你们所干的肮脏勾当，按法律甚至该判处死刑。”

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肯定是个误会，我认识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的几百名代表，我曾经会见过那么多的外国人，要把他们都说一遍，即使一个星期的时间也不够用。也许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被捕了并且提到了我的名字？但是我一向是个遵守纪律的党员，假如我有什么批评意见，历来是藏在自己心里或写信向党的领导反映的。

我开始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写，很快就把纸交给两位看守中的一位。不久，他把我带到调查委员会的房间里，我刚才见到的那些人已经全部聚集在那里了，只有一个人不在。

“我看，你们是不愿意去进行回忆。那我只好恢复一下你们的记忆了”，委员会主任说道。“是关于——其实你们自己应当很清楚——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你们通过它把情报送到贝尔格莱德，然后这些情报又到了美帝国主义者手里。同你们进行联系的是一个名叫彼洛·伊瓦契奇的南斯拉夫人，他是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组织‘国家保安处’的上校……。”

接着，他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

“要老实交待！把你们所知道的有关情况统统写出来：你们是什么时候同他见面的，多长时间见一次面，谈了些什么，向他提供了哪些秘密文件，他给了你们多少钱！”